

海外学者视角下中国五年规划的 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王 峰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用五年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经验。海外学者高度重视对中国五年规划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研究,通过对中国五年规划的目标任务、主要内容、鲜明特征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分析,形成了关于中国五年规划彰显中国制度优势和强大治理效能的基本认知,为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制度优势提供了有利途径和重要支撑。海外学者关于中国五年规划研究的方法、视角、焦点、结论等为我们提供了全面认识中国五年规划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他者”视角,对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凝聚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五年规划;制度优势;治理效能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26)01-0001-12

五年规划^①是体现中国国家战略任务、发展方向和远景目标的一种制度设计,是“中国之治”的生动体现。海外学者高度重视对中国五年规划的研究,将五年规划视为解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途径。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一方面,主要集中于五年规划的目标任务、基本内容、鲜明特征等基本问题,紧紧围绕五年规划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作用来展开;另一方面,呈现出研究视角从意识形态评价转向制度理性分析,研究重点从经济计划扩展至社会治理,研究方法从宏观叙述走向实证分析的趋向,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和成就。为正确理解

海外学者关于中国五年规划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认知评价,本文以海外学者关于中国五年规划的研究文献为基础,梳理分析其对五年规划的目标任务、主要内容、鲜明特征等问题的研究,从“他者”视角透视中国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一、中国五年规划的目标任务

科学编制中长期规划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战略定力、掌握历史主动的制度设计和政治优势。在海外学者看来,中国五年规划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政策,更是一种将国家发展目标制度化、长期化的治理工具,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资源配置、强化国家在重大决策中的主导作用,依托举国体制统筹布局,并以

收稿日期:2025-11-20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253200039)

作者简介:王峰,男,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史、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

规划的程序化和法定化提升整体治理能力。

(一)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资源配置

海外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制定五年规划的目的之一,是通过产业政策和重大项目实现跨部门、跨地区的资源配置,发挥国家在发展路径选择上的主导作用。

中国“一五”计划是在中国工业生产极其落后的现实国情基础上和中国期望快速发展壮大的愿望下制定和实施的,其显著特征就是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发展重工业,奠定中国快速发展的工业基础。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等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实施了“非常成功的发展规划”,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约8.9%,重工业产出增长尤为突出^[1]。一项关于“三五”计划的研究指出,这种以集中力量为基础的五年计划,使中国能够集中资源发展工业,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两次核试验被视为这一选择的标志性成果^[2]。在海外学者看来,早期五年计划是一种“战略性资源集中”,即在有限时间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实现国家能力的快速提升,但同时也导致了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上的结构性失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产业政策常常以规划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样就使市场主体能够形成关于未来若干年的发展预期。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认为,中国的计划体制逐渐从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指导性规划,更多通过确定目标、划分重点领域、提出经济发展方向,引导财政、金融和土地等关键要素向特定部门集聚^{[3]87-88}。从这种视角看,五年规划中的产业政策不仅是资源配置工具,也是实现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重要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学者高度重视中国五年规划在推进技术升级与绿色转型中的作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甘思德张克斯在评估“十三五”规划时指出,该规划是关于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方向的最具权威性的战略愿景,是对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最具政治权威性的声明,中国“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在于促进创新,鼓励发展先进技术,加强环境保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通过加大投资和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来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地位^[4]。美国国务院研究员奥利佛·麦尔敦在2015年向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的证词中强调,五年规划是中

国协调和实施国家部委及地方政府政策的核心机制,并在改革计划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麦尔敦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五年计划已由传统的命令式经济计划转变为集协调、指导、激励和监督于一体的综合治理机制,更适应市场化与分权化条件下的政策实施需求。五年规划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划,形成多层次子规划,整合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治理、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等多方面政策目标,将国家战略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行动^[5]。事实上,中国正是通过五年规划制定产业政策,引导资源在不同行业、地区和生产要素之间重新配置,为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发挥举国体制的统筹优势

海外学界普遍认为,与其他同样采用计划体制的国家相比中国五年规划之所以具有独特优势,根源在于中国不断将五年规划与举国体制相结合,并将其作为统筹跨部门、跨地区重大工程的核心机制。

以美国学者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为代表,他们在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决策过程时指出,国家计委是中国政治体系中最重要协调统筹机构之一,国家计委通过五年计划把分散在各部委、各地区的项目和诉求进行统筹协调,在反复协商与权衡中形成了具有约束力的国家整体计划,五年计划由此被理解为在权力结构中实现统筹协调的关键机制^[6]。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黄佩华通过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公共投资管理实践,进一步揭示了计划在统筹资源配置中的具体运作机制。她认为,国家计委制定投资计划,是与各部委上下协商的过程。正是依靠五年计划,中央政府能够在部门和地方之间进行协调与平衡,从而把举国体制下分散的利益诉求整合为相对统一的国家发展方案^[7]。这实际上支持了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的观点。美国学者巴里·诺顿把“三线建设”描述为中国为保障国家安全,通过计划动员全国资源,在内陆地区构建“战略后方工业基地”,在国防安全、地区平衡、产业布局之间做出系统安排的整体工程。尽管诺顿总体上认为“三线建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乐观,但其研究凸显了五年计划在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维度上进行统筹设计的功能^[8]。后续的研究普遍将南水北调、西电(气)东输、高速铁路网络等大型工程视为中国五年规划体系发挥举国体制效能的典型案列。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的

分析指出,西电东送工程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启动,体现了中国在跨区域能源调配中的统筹能力^[9]。世界银行在其有关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报告中认为,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通过一系列五年铁路发展规划实施,实质上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等国家总体规划目标^[10]。美国兰德公司(RAND)在研究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战略时指出,“东数西算”工程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并被定位为全国统一算力网络的重要布局,旨在加强数据中心、能源利用及数字基础设施的统筹协调^[11]。总体来看,中国通过将此类重大工程纳入五年规划及中长期专项规划,实现了跨部门与跨区域的统筹协调,使国家发展与安全目标得以在更高层级上统筹推进。

(三)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五年规划是中国实现宏观调控的重要制度,中国通过五年规划完成中长期目标与政策协调,为经济运行提供稳定的方向指引。

早在20世纪60年代,海外学者就通过分析中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对农业、工业等不同产业投入的占比,来推断中国对国防安全与经济综合投入,说明五年计划自形成之初便是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宏观政策意图的重要文本^[2]。改革开放以后,巴里·诺顿等海外学者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规模扩大与治理能力提升,中国的五年规划从政府的直接控制逐步转向间接引导。一方面,五年规划通过GDP、投资结构、通胀和就业等宏观指标构建起国家经济评价体系。规划作为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手段,可以以多种方式实现发展目标,各级政府机关都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并使用多种政策手段,从而使规划不仅能承载宏观经济与再分配政策的运作结果,也与市场经济完全兼容^[12]。另一方面,五年规划通过能耗、环境、贫困等约束性指标形成对地方政府的硬性考核,使规划既能传递政策信号,又构成实践中可操作的综合治理策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政策流程的程序化与制度化,为中国后续的规划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13]。正如德国学者韩博天与前美国国务院高级顾问奥利佛·麦尔敦等人所评价的那样,新型计划体制不但为市场发展和政府放权提供了空间,同时也为行政部门和执政党对经济保有控制力提供了保障,2005年五年计划更名为五年规划后,五年规划更是成为制定各种公共政

策的主要手段^[14]。

海外学者也高度重视五年规划在执行过程中的情况,他们往往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来分析五年规划在绩效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例如,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吉尼亚·科斯特卡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副教授聂佑宁的研究指出,中国以五年规划为代表的制度顶层设计被转化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从而推动中央制度在地方落地见效^[15]。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斯特罗姆塞斯等在《中国治理难题》一书中指出,中国进一步突出规划在“政策透明度与参与度”中的作用,通过采用公众参与程序,包括专家咨询、公开听证会,以及近年兴起的公众意见征集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策合法性与治理效能^[16]^[18, 190-191, 240-241]。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尽管连续的五年规划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保持连续性和及时修正偏差提供了空间,使其在外部冲击与内部结构矛盾下仍保持总体稳定,但规划的高目标与强约束性容易削弱政策灵活性,可能引发“目标过载”“指标主义”的负面影响^[17]。正是在这种正面评价与批判性讨论并存的过程中,五年规划日益成为海外学者理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演进与宏观治理模式的关键切入点。

二、中国五年规划的主要内容

从“一五”计划开始至今,中国已经连续制定并实施了十四个五年规划,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目前,中国正在制定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五年规划时,往往把五年规划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的演进视为一个整体,重点关注经济、社会、生态和安全等领域,研究分析五年规划对中国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彰显的制度优势。

(一)经济发展

从“一五”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到当前围绕创新与消费的高质量发展议程,五年规划经济内容的演变,构成了海外学者理解中国发展模式变迁的主线之一。

“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被视为中国建立工业化及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制度基础。海外研究普遍把“一五”计划视为典型的苏联式工业化计划,这种重工业优先与社会主义改造并进的发展模式,为此后多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本路径基础。《中国

季刊》的一份关于20世纪50年代新疆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指出,“新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的目标是实现经济自给自足……(新疆)1950年仅有14家工厂,到1955年已增至64家,当年产量更是达到1950年的10倍”,“1958年,当第二个五年计划启动时,新疆党委遵照第八次党代会的指示,宣布将新疆建设成为铁、钢、石油、煤炭和棉花生产基地,为此启动了多阶段生产运动”^[18]。这一研究成果,正是中国通过“一五”计划推动工业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典型证据。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五年计划内容出现明显转变,第六个五年计划被认为是从“恢复调整”走向“改革与开放”的承前启后的文件,强调提高经济效率、扩大对外贸易,而不再单纯追求生产指标的攀升。

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战略目的从“数量型增长目标”转向“经济社会增长目标的结构性和质量性调整”,开始突出服务业发展、扩大国内需求以及区域协调发展,并首次较系统地纳入环境可持续性目标。韩博天和奥利佛·麦尔敦认为,中国旧式的计划模式在1993年前后已经失效,新的规划“削减计划功能,转而成为经济结构转型和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提供宏观指导,这与早期以指标和项目为核心的计划形成了鲜明对比^[14]。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中国经济从出口和投资主导向消费和服务业主导的转向并非新议题,它早已被纳入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和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只是规划在落地的过程中遭遇了一些阻力,“公平地说,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打乱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期的转向进程,导致通过大规模刺激补贴延续了旧有增长模式。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期间,转向取得了较大进展”^[19]。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以及正在制定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都强调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例如,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对“十四五”时期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持续推进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20];而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十五五”规划延续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这为美国敲响了警钟^[21]。除此之外,美国《外交学人》(*The Diplomat*)杂志的一项研究

也指出,中国希望在继续支持高技术制造业的同时,更加重视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和扩大社会支出以扩大内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项研究从更长的历史时间段来考察中国的经济变化,认为“中国经济的重大结构性转变——如20世纪80年代的农业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推进以及21世纪第二个10年向创新主导增长的过渡——都已通过五年规划进行设计、组织和协调。每项计划都为国家五年来的社会和经济优先事项定下了基调,其溢出效应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边界”^[22]。这项研究高度评价“十五五”规划,认为中国“通过将资源集中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半导体和先进制造领域,建立世界领先的科技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五五’规划代表了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飞跃。它试图将技术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用‘越强越好’的新模式取代‘越大越好’的旧增长叙事”^[22]。

(二) 社会民生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更好地惠及民生、造福民众。海外学界的研究生动地说明了中国五年规划的这一本质。海外学者认为,五年规划的社会民生内容实现了从最初以城市单位为中心的福利安排,到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再到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目标的转变。

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在“一五”计划到“六五”计划阶段,社会政策基本是被隐含在分配制度中的,没有设定专门的目标。直到1986年的“七五”计划,“社会保障”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中长期规划中。巴里·诺顿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一书中指出,“一五”计划实行后,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1952年至1957年间工业年均增速达17%;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得到振兴,教育与培训领域的巨额投资更为未来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这是社会流动加速的时期,农民纷纷进城谋生,年轻人纷纷进入大学深造”^[368]。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单位负责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和福利,包括工作保障、口粮、医疗、退休金、子女教育、低价住房等。1978年以后,随着计划体制被打破,五年计划中逐步出现“农村合作医疗”“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议题。2013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斯坦·林根和中国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岳经纶在联合

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保障的概念于1986年首次被纳入国家中长期目标规划,即“七五”计划^[23]。此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最初10年被视为社会政策的“制度化阶段”,一系列规划文件开始把贫困救助、养老、医疗保险和住房保障纳入全国性的政策框架。日本厚生省在《亚洲及大洋洲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指出,中国“九五”计划明确提出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障等。在此推动下,1998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集中参与和监督社会保障服务,这些服务分布在多个部门^[24]。

进入第十二、第十三和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时期,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织密社会保障网、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将其写入规划纲要。在深入观察和研究分析中国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海外学者对中国通过五年规划发展社会民生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研究学者罗斯高等提出,中国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就业、产业升级、城镇化)让大规模人口摆脱贫困^[25]。精准扶贫延续了中国农村改革和减贫制度的长期逻辑,是国家推动农村发展的一次制度创新^[26]。加拿大学者史泰丽指出,中国的政策机构以规划为中心构建。五年规划提供了从中央到地方明确传达的政策目标,目标的实现与奖惩机制紧密挂钩。通过这种方式,制定了清晰的政策路线图和激励措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新增了减贫目标,并将其列为“强制性”目标。这意味着消除贫困的目标被直接纳入中国政策执行的制度体系,成为最高优先级事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脱贫目标的实现^[27]。巴里·诺顿也称,中国消除贫困的目标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有了更为具体的实现形式,该规划设立了更有约束力的精准脱贫目标^[28]。

(三)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五年规划关于生态文明的制度设计经历了从21世纪初纳入环境和资源约束指标,再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将能耗、排放和生态修复纳入硬约束性指标,并与国际气候承诺相衔接的过程。这个变化过程,为海外研究者观察中国如何转向可持续发展,如何借助规划工具推进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早期五年计划中较少涉及环境内容。美国学

者易明在《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一书中认为,20世纪中后期中国采取粗放式工业化与资源密集型的开发模式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环境治理则呈现“末端治理”(end of pipe)或“补救式”(remedial)特征,缺乏系统性的预防机制与有效的制度执行力^[29]。中国气候变化事务前特使解振华对中国环境保护制度演进的回顾性研究也表明,尽管1979年就有《环境保护法(试行)》,但直到1990年以后,环境管理体系才逐步走向法治化和规划化,环境议题才开始被系统写入国家中长期规划,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等目标被纳入国家“十五”计划的主要目标中^[30]。这一转变在五年规划中有着清晰体现:第十个五年计划首次在总体规划中较为明确地提出“环境可持续性”目标,提出提高森林覆盖率、扩大城市绿地、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等指标,这标志着环境议题第一次成为国家发展规划中的重要内容。韩博天和奥利佛·麦尔敦将“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减排作为五年规划执行效能的案例进行研究,认为“2000年到2005年经历了一次惊人的能源消费暴增之后,中国领导人规划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全国节能减排行动,把单位GDP能耗降低20%列入‘十一五’8个‘约束性’指标之一,同时作为干部考核的内容之一”^[31]。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的研究报告肯定了“十一五”期间中国环境整治的效果,认为2007年到2008年之间各类实施方案出台后,能源消耗急剧减少,节约效果明显,到2008年年底“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已实现三分之一^[32]。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则进一步将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下降纳入主要约束性指标。美国乔治城大学能源与环境学教授乔安娜·刘易斯认为,“十二五”规划把相当多的篇幅用于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提出了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发展低碳能源、重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目标,包括降低单位GDP能耗和逐步建立碳交易市场等^[33]。中国政府按照五年规划的要求加强环境治理后,中国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也持续增加。碳简报(Carbon Brief)分析指出,“十四五”规划将2021—202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18%、能源消耗量下降13.5%作为核心约束性目标之一,并首次提出探索碳排放总量控制的思路,使气候目标

在五年规划中居于更加突出的位置^[32]。同时,自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来,新能源、风电、光伏和电动车等领域的政策被系统写入规划,推动相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路透社在报道中评论,中国10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增长最快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近年随着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能力的加快应用,中国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33]。

(四) 国防安全

海外学者研究中国五年规划中的国防与外交问题,主要在于分析中国如何通过规划将发展目标和安全关切、国内建设与国际担当结合起来。

国防安全自“一五”时期起就被纳入五年规划之中,但在不同时期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战略便是为中国国防工业奠定基础的重要举措,这一时期大量重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被部署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此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也成为这一倾向的集中体现。诺顿对“三线建设”的研究表明,这一大规模国防工业布局,旨在建立“战时战略后备工业基地”,通过中央计划动员全国资源,是在特定安全威胁下把国防需求嵌入国家发展规划的典型案例^[8]。改革开放后,国防现代化逐步在总体发展规划中被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军民融合”等话语呈现。沈大伟的《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问题与前景》(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和后续研究认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并非孤立推进,而是嵌入国家整体现代化战略框架之中,受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能力的双重制约^[34]。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始在五年规划中被反复提及。“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安全与发展一体推进”的框架下,将政治安全、人民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统筹考虑,并强调要把国家安全要求融入发展各领域和各环节^[35],表明国防安全目标在规划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海外学者普遍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标志着中国安全理念从传统的以军事、领土为核心的“狭义安全”,转向涵盖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生态、网络与海外利益等多领域的“广义安全”,其影响在中国的五年规划中持续强化,尤其在“十三五”规划与“十四五”规划中呈现出结构性的制度化特征。德国墨

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在其关于中国“十四五”规划的系列报告中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首次在五年规划中以系统化的方式出现,标志着中国将安全问题从传统的国防领域扩展至多领域^[36]。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白明与前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认为,“十四五”规划将政治安全、科技安全、产业链安全写入主要篇章,显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制度化已经深入国家中长期规划体系,表明中国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科技竞争、地缘政治风险、意识形态安全等纳入结构性治理目标^[37]。此外,美国^[38]与日本^[39]多家智库普遍关注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对外经济关系、科技竞争、供应链安全及地缘战略的影响,认为其推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用更加系统化、主动化的安全思维,同时也带来信息管理趋严、社会治理加强等治理方式的变化。

三、中国五年规划的鲜明特征

在海外学者的研究中,中国五年规划既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度化工具,也是理解中国治理模式的重要窗口,与西方国家以预算周期或部门政策为主的政策制定方式不同,五年规划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独特性。

(一) 长期目标导向与动态调整相结合

在海外学者看来,中国五年规划并不是僵化的计划,而是一套稳定目标与动态调整相结合的制度框架,既确保了战略方向不偏移,也允许政策在实施阶段适时微调。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五年规划最鲜明的制度特征,是把长期发展方向与灵活政策调整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稳步向前发展。韩博天认为,政策试验机制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模式,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策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所使用的方法和术语,如“试点”“由点到面”等,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中国通过先行试点、逐步推广形成动态调整机制,使五年规划虽然设定中长期方向,但并不僵化^[40]。与此同时,韩博天和奥利弗·麦尔敦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中国正在对发展规划进行再创新,“研究证实,中国的计划体系在经济转型中持续演变,至今仍是几乎所有公共政策制定领域及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稳定的政治机构的核心。通过将试验性项目纳入宏观规划、建立分层政策监督体系、引入中期规划评估机制以及系统

化政策审查,中国规划得以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发挥核心作用,避免陷入传统计划经济导致的僵化陷阱”^[41]。五年规划已从单纯的经济计划转变为国家战略的制度化方略,其核心功能是明确发展愿景,并通过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协调机构推动战略落实。这意味着,五年规划在目标层面具有高度稳定性,在工具层面也具有开放性。奥利佛·麦尔敦在2015年的研究中也强调,“中国的五年规划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一、连贯的计划,甚至也不完全包含在一个明确的五年期内。与其说是一个静态的政策蓝图,不如说五年规划是一个渐进的规划和政策制定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机制,系统地将信息从基层上传到中央政府,处理和分析这些信息以支持政策决策,分配和协调整个政府体系的实施过程,然后监督这些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执行这些政策的官员。五年规划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治理手段。中央领导层可以借助规划体系来强化对政策方向的掌控,通过设定规划目标和任务等,引导各部委和地方政府设定工作重点、资源安排和绩效考核,从而把不同层级的力量统一到规划实施上来。然而,五年规划实际上旨在保持高度的制度灵活性和地方自主权,这是中国高度分权制度的典型特征。可以说,五年规划强化了分层管理和中央监督体系,确保中央对关键政策参数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又不过度集中决策权或微观管理地方官员”^[42]。沈大伟的一项研究则将这一特征概括为“战略性长期主义”(strategic long-termism)。他认为,五年规划通过设定10年至15年的发展路径,使政策具有方向一致性;同时,中国治理体系内部又具备较高的灵活调整能力,使长周期目标能够与短周期政策工具有效衔接^[43]。

(二)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协同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不仅在于其具有行政命令的约束力,更在于其提供了一套“国家引导方向、市场完成调整”的组织机制,使国家与市场之间呈现“协同竞合”的治理结构,是一种政府引导与市场激励相协同的制度安排。

在解释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特征的研究中,海外学者经常提到的是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戴慕珍的观点,即中国地方政府经常以“发展型行为者”的身份参与和组织市场活动,通过规划、财政激励和政策信号引导企业行为^[44]。这一研究结论被广泛

用于解释中央制定发展方向、地方因地制宜贯彻落实的有效机制。同时,海外经济学与政治学研究也将规划称为发展的“信号机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洪源远认为,中国发展是一种“政府搭桥、市场走路”的机制,即国家提供方向、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而真正完成资源配置的主体仍然是市场。她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非线性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互动的耦合关系,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指导与地方官员自下而上的推进相结合。五年规划作为政策信号的意义在于,它向市场主体明确“未来增长点”“投资方向”和“结构调整优先级”^[45]。这些观点,已经成为海外学者对中国五年规划研究的基本共识。比如,吉尼亚·科斯特卡指出,“十一五”“十二五”五年规划等通过设立指标、激励机制和资源倾斜,引导地方政府与企业参与政策目标,从而形成人们所说的“激励型治理结构”^[46]。乔纳森·斯特罗姆塞斯认为,中国的规划统筹并不意味着自上而下的单向命令,而是包含了透明度提升、社会参与和地方实验在内的多层次治理安排^[46]。正是这些显著特征,使得国际社会在观察中国五年规划时越来越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包含“自上而下顶层设计”“自下而上政策试点”的制度设计,即强调中央通过五年规划制定明确的地方发展目标与监测措施,地方政府则在规划和框架内进行地方试点,再将优秀经验逐步上升为国家规划,实现经验的全国推广。这一特点,也正是五年规划制度优势的突出表现。

(三)发展目标的约束性与灵活性相平衡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五年规划通过“强目标、软工具”的方式,把制度约束性与执行灵活性结合起来,使五年规划既成为国家治理的硬要求,也成为地方和部门可以操作的政策工具。

在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一个受到持续关注的特征,是五年规划兼具目标约束性与执行弹性。他们认为,在中央层面,规划设定发展方向,并通过约束性指标明确政策目标;在地方层面,执行主体则因地制宜地对政策落地进行策略性调节,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模式。这一特点,被视为理解中国治理机制的重要窗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研究系主任毛学峰指出,中国的治理模式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不同部门和地方政府都会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五

年规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在整体规划上实现部门与地方的统筹,从而更好地推进国家整体规划与目标^[46]。柏林洪堡大学教授莎拉·伊顿与柏林自由大学吉尼亚·科斯特卡对山西环境的研究被视为该治理模式最典型的实证案例。研究发现,中央对能源强度、污染物减排等设置强制性指标,构建明确的规划体系推动地方落实中央规划。如在“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中,中央将“硬性”(约束性)指标与“软性”(预期性)指标纳入地方干部的激励体系中。地方在执行过程中经常根据当地现实条件进行策略性调整,形成结构性偏差,这类偏差并非对中央规划的否定,而是规划体系所内嵌的适应性空间^[47]。吉尼亚·科斯特卡与聂佑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治理机制,即中国治理体系具有一种“组合式的执行结构”,中央通过约束性指标确保政策方向,而地方则通过试点、协商、资源调节等灵活工具完成落实。与此同时,政府的诸多事务已下放至地方层面,由地方负责提供公共服务、执行法律法规^[48]。这种治理结构,使规划体系形成方向一致性与执行多样性并存的结构特征。对于五年规划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的问题,海外学者认为这是地方政府按照五年规划因地制宜自主执行的结果,是制度允许的灵活性调整。例如,奥利弗·麦尔敦认为,五年规划是中央对各级政府设定政策方向与目标的主要机制,其目的不是细化每一项政策,而是提供一个“大框架”,让中央能通过目标体系影响地方资源分配与政策方向。五年规划的目标往往宽泛、不完全量化,中央“定方向不定细节”,因此需要地方政府将其转化成可执行的工作任务,这就为地方的执行创造了自主空间的制度基础^[49]。巴里·诺顿也强调,中国的五年规划不是传统苏联式的硬计划,而是指导性规划(indicative planning),规划的目标往往方向性强、硬度不足,从而给地方提供了大量自主裁量的空间^[48]。

四、对海外学者研究成果的评价

海外学者对中国五年规划目标、内容、特点等方面的系统研究,不仅向世界解释了“中国之治”的奥秘,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五年规划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他者”视角。

(一)研究视角从意识形态评价转向制度理性分析

海外学者对中国五年规划的早期研究由于深

受冷战思维影响,常被置入意识形态分析框架,作为计划经济的典型表达。例如,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国家权力的集中、资源配置的行政逻辑等主题展开,认为中国在计划体制之下推行“一五”“二五”计划与“三线建设”等实现工业化高度集中式的建设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资源配置的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六五”计划以后逐渐脱离传统计划经济范式,开启市场化转型进程。中国五年规划从指令性计划向战略性、综合性发展规划的现实转型,促使海外学界对五年规划的研究视角从整体性的意识形态评价转向对规划机制本身的理性分析。韩博天在对地方落实中央规划的模式与过程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试验式治理”观点,认为中国的政策形成方式依托“五年规划提供方向—地方试点进行反馈”的循环结构,呈现出一种具有开放性与层级互动性的治理模式^[44]。毛学峰也基于规划体系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现象,将政策执行中的跨部门协调与赋予自主性理解为推动政策创新的动力,而非体制功能失灵的象征^[46]。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海外学界对规划的认识逐渐从计划体制批判向制度分析转变。1987年,美国学者傅高义通过为期7个月、涵盖14个地区的田野研究,提出广东改革的成功源于“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改革模式,即地方试验推动突破,中央推动地方试验这一机制^[49]。20世纪80年代,海外学界对“中国模式”兴趣迅速上升,巴里·诺顿利用深入接触中国经济档案、统计资料及访谈地方官员和工厂管理者的机会,对1950—1970年中国的工业结构、资源配置方式与计划机制开展系统分析,基于这些研究材料作出经济结构解读。这都体现了海外学者对规划的研究转向。推动海外学者研究取向转变的根本动力,来自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型,这为海外学者研究有关改革路径与体制演化的新学术议题提供了基础条件。

(二)研究重点从经济计划扩展至国家治理

在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海外学者关于五年规划的研究重点也发生了转移,即从经济计划转向国家治理的考察,这从侧面体现了中国规划制度从经济建设向综合治理体系的演进历程。“一五”“二五”时期,海外研究多聚焦于工业化路径、资源配置与宏观调控等经济领域,计划被视为国家推进重工业建设和基础

设施布局的重要政策工具,其研究范式带有强烈的经济学色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五年规划在目标结构、功能定位与制度体系上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国土空间规划陆续形成体系,使五年规划从承载经济增长目标的技术性计划,转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与丰富的重要抓手。这一制度功能的扩展,促使海外学界将研究焦点从经济计划转向国家能力、政策过程与治理结构。例如,莎拉·伊顿与吉尼亚·科斯特卡从环境治理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治理模式,认为中央通过约束性指标强化政策压力,而地方政府则通过策略性执行形成具有弹性的落实方式,这一机制因五年规划而得以制度化^[47]。当前,在海外学界对中国绿色转型、数字化战略与产业升级的研究分析中,五年规划正逐渐成为理解中国战略目标的关键维度。这一现象也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五年规划的认知转变,即五年规划已不再被视为单纯的技术性政策文件,而是成为分析国家治理逻辑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的重要制度设计。

(三)研究方法从宏观叙述转向实证分析

在冷战格局下的早期研究中,五年计划常被置于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分析,被赋予高度集中、资源配置的行政化等特征。与此同时,一些以档案与宏观经济数据为研究基础的学者,如麦克法夸尔等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强调“一五”计划在极为有限的国际技术与资本环境中仍成功建立重工业体系,以及巴里·诺顿对“三线建设”及早期计划体制的结构分析,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简单的意识形态判断,为之后更细致的制度考察拓宽了道路。然而,这些研究仍然停留在国家层面,难以深入解释中国政策执行层面的多样性与地方差异。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五年规划逐步从指令性计划转型为兼具方向引导与结构协调功能的战略规划工具,这一转变也促使海外学界将研究重心从宏观叙述转向地方与部门层面的实证探究。傅高义对广东改革经验的研究、戴慕珍对中国县域治理与乡村社会网络的田野考察,正是在地方自主空间扩大、规划灵活性增强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这类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规划框架中已不再是单纯的政策执行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成为观察五年规划的重要途径,地方经验被纳入五年规划研究的核心视野之中。莎拉·伊顿与吉尼亚·科斯特卡历时5

个月,通过89次实地访谈(山西45次、湖南26次、山东18次)揭示了中国干部激励结构、任期安排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关联,从而对将中国治理简单解读为威权集中式模式的观点提出了有力质疑^[47]。

(四)研究结果证实了五年规划的独特制度优势

虽然海外学者对中国五年规划研究的主观目的是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社会的真实发展模式 and 状态,但是客观上他们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向外部展示了中国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以及中国发展的崭新形象。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将五年规划作为分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种有效方式。中国五年规划在指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使海外学者认识到中国五年规划不仅是一种发展战略工具,也是维持政治稳定、塑造社会预期与强化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制度安排。这种稳定性既体现在政策过程的制度化上,也体现在发展战略的延续性上。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在研究中国新农村建设时认为,中国治理正在从高度动员型政治向“可预测、可制度化的治理模式”转型,通过设定清晰政策目标与统一方向的规划机制,政府试图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制度信任^[50]。沈大伟将中国五年规划概括为“战略性长期主义”,认为五年规划提供了超越行政任期的政策框架,使国家能够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维持发展战略的连续性。这种制度化的预期管理,使政策的方向、节奏与优先级对社会主体更加透明,从而在宏观层面发挥出“稳定器”的功能^[42]。韩博天与奥利佛·麦尔敦进一步强调,规划通过建立跨部门协调与评估机制,使发展战略具有稳定方向与动态调整并存的特征,从而在危机时期,强化了社会预期和国家治理能力^[41]。海外学者的研究还指出,五年规划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中最具制度化特征的部分。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认为,中国的五年规划通过设定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可量化目标,使减贫、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追赶呈现出“路径依赖式”的战略推进方式,并为国家长期发展提供了高度清晰的路线图^[5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也认为,中国的五年规划通过协调中央与地方、整合跨部门政策工具,使中国能够在关键领域形成持续的政策动能,并在金融危机与公共卫生事件等外部冲击中保持战略稳定性,从而增强了社会预期与治理韧性^[52-53]。在海外研究

者看来,五年规划不仅是经济工具,也是维系共识、强化治理合法性的核心制度。

注释:

①五年规划,原称五年计划,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为尊重历史事实,本文在论及“一五”至“十五”计划时称为“五年计划”,论及“十一五”及其后的规划时称“五年规划”。

参考文献:

- [1]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41-145.
- [2]WILLIAM C. China's Third Five-Year Plan[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6(25):171-175.
- [3]NAUGHTON B.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7.
- [4]KENNEDY S, JOHNSON C. *Perfecting China, Inc: China's Thirteen Five-Year Plan*[R].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6.
- [5]MELTON O. *China's Five-Year Planning System: Implications for the Reform Agenda*[R]. Washington, DC: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5-04-22.
- [6]LIEBERTHAL K, OKSENBERG M.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152-154.
- [7]WONG C. *China: PIM under Reform and Decentralization*[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4.
- [8]NAUGHTON B.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J]. *The China Quarterly*, 1988(115):351-386.
- [9]Wilson Center. *Mapping China's Massive West-East Electricity Transfer Project*[EB/OL]. (2013-02-20)[2025-11-01].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mapping-chinas-massive-west-east-electricity-transfer-project>.
- [10]LAWRENCE M, BULLOCK R, LIU Z. *China's High-Speed Rail Development*[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9.
- [11]CHAN K, SMITH G, GOODRICH J, et al. *China's Evolv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 AI*[R].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25.
- [12]诺顿,杨帆.经济发展计划体系在中国的回归:论韩博天、麦尔敦和胡鞍钢的研究[J].*开放时代*, 2013(6):38-45.
- [13]CHEN L, NAUGHTON B. *An Institutionalized Policy-Making Mechanism: China's Return to Techno-Industrial Policy*[J]. *Research Policy*, 2016(10):2138-2152.
- [14]韩博天,麦尔敦,石磊.规划:中国政策过程的核心机制[J].*开放时代*, 2013(6):8-31.
- [15]KOSTKA G, NAHM J. *Central-local Relations: Recent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7(231):567-582.
- [16]STROMSETH J R, MALESKY E J, GUEORGUEV D D. *China's Governance Puzzle: Enabling Transparen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 Single-Party Sta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19.
- [17]PEI M. *China's Governance Crisis*[J]. *Foreign Affairs*, 2002(5):96-109:19.
- [18]LO J P. *Five Years of the Sinkiang-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1955-60*[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1(8):92-105.
- [19]SHAMBAUGH D. *Contemplating China's Future* [J].*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6(3):121-130.
- [20]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Strengthening the Domestic Base to Become a Superpower[EB/OL]. (2024-04-09)[2025-11-01]. <https://merics.org/en/comment/chinas-14th-five-year-plan-strengthening-domestic-base-become-superpower>.
- [21]China's New Five-Year Plan Should Be a Wake-Up Call for the United States[EB/OL]. (2025-11-20)[2025-11-22].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chinas-new-five-year-plan-should-be-a-wake-up-call-for-the-united-states/>.

- [22]China's Next Five-Year Plan Will Bet on Technology at Home and Abroad[EB/OL]. (2025-10-16)[2025-11-01].<https://thediplomat.com/2025/10/chinas-next-five-year-plan-will-bet-on-technology-at-home-and-abroad/>.
- [23]RINGEN S, KINGLUN N. What Kind of Welfare State Is Emerging in China? [R]. Geneva: UNRISD, 2013.
- [24]Social Security Systems in Asian and Oceanian Countries: China Chapter[R]. Tokyo: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1999.
- [25]ROZELLE S, HELL N. Invisible China: How the Urban-Rural Divide Threatens China's Rise[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2.
- [26]王世博. 中国政府靠什么赢得民众高度信任? [EB/OL]. (2022-06-09) [2025-11-01].<https://news.haiwainet.cn/n/2022/0609/c3543116-3238940-8.html>.
- [27]SICULAR T. Will China Eliminate Poverty in 2020? [J].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020 (66):6-13.
- [28]诺顿. 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M]. 安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237.
- [29]ECONOMY E C. 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65-67.
- [30]解振华.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变革:从“三废”治理走向生态文明建设[J]. 中国环境管理, 2019(4):5-10, 16.
- [31]LEWIS J. Energy and Climate Goals of China's 12th Five-Year Plan[R]. Washington, DC: Pew Center, 2011.
- [32]What Does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Mean for Climate Change? [EB/OL]. (2021-03-12) [2025-11-01].<https://www.carbonbrief.org/qa-what-does-chinas-14th-five-year-plan-mean-for-climate-change/>.
- [33]Colleen Howe. Explainer: The Numbers behind China's Renewable Energy Boom[EB/OL]. (2023-11-15) [2025-11-20]. <https://www.reuters.com/sustainability/climate-energy/numbers-behind-chinas-renewable-energy-boom-2023-11-15/>.
- [34]SHAMBAUGH D.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M]. 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367.
-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 (2021-03-13) [2025-11-01].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36]DRINHAUSEN K, LEGARDA H.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 Unleashed: How Xi's Approach Shapes China's Policies at Home and Abroad[R]. Berlin:MERICS, 2022-09-15.
- [37]BLANCHETTE J, MEDEIROS E S. I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ady for the Future? [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21(2):21-43.
- [38]CORPORATION R. China's Strategic Priorities and the 14th Five-Year Plan[R]. Santa Monica, CA:RAND Corporation, 2021.
- [39]NIDS.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under the 14th Five-Year Plan [R]. Tokyo: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2022.
- [40]HEILMANN S. 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J]. The China Journal, 2008(59): 3.
- [41]HEILMANN S, MELTON O. The Reinvention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China, 1993-2012[J]. Modern China, 2013(6):580-628.
- [42]SHAMBAUGH D. Coping with a Conflicted China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1(210):313-342.
- [43]OI J.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5(114):1132-1149.
- [44]ANG Y Y.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74-75, 94.
- [45]KOSTKA G. Command without Control: The Case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Target System[J]. Regulation & Governance, 2016(1):58-74.
- [46]MERTHA A.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9(200):995-1012.
- [47]EATON S, KOSTKA G. Authoritarian Environ-

- mentalism Undermined? Local Leaders' Time Horizon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4 (218) : 359-380.
- [48] NAUGHTON B. China's Experience with Guidance Planning[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0(14):743-767.
- [49] 傅高义. 先行一步: 改革中的广东[M]. 孙立新,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2-8.
- [50] ELIZABETH J. Perry. From Mass Campaigns to Managed Campaigns[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1(201):1-28.
- [51] MERICS. *Decoding China's Five-Year Plans: The Planning Process and Its Global Implications* [R]. Berlin: MERICS, 2019.
- [52] UNDP.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 A Model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R]. New York: UNDP, 2019.
- [53] UNDP. *Long-term Strategic Planning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essons from China*[R]. New York: UNDP, 2021.
- 责任编辑 陈 曲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Five-year Pl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seas Scholars

Wang Feng

Abstract: Guid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Five-year plans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a key experience behind China'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since 1949. Overseas scholar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studying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the Five-year plan system. Through analyzing basic issues such as goals, main content,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a's Five-year plans, they have formed a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that these plans highlight China's institutional strengths and possess strong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is provid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a beneficial way and solid facts for correctly recogniz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it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he methods, perspectives, focuses, and conclusions of overseas scholars' research on China's Five-year plans offer us an "other's" viewpoint for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thes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strengthening the "Four Confidences" and rallying mighty strength to buil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ve-year Plan;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